第二章 迄今为止在确定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

1. 马克思的门徒

对本来如此丰富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文献进行调查，就会发现，关于这种形式的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著作极少，而这种社会的目的是取代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我们找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分析，它的结论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把选择权摆在它面前，要么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后在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继续生产，要么——陷入野蛮状态。这一伟大的科学成就使社会主义脱离了乌托邦的范畴，使它站在了科学思想的坚实基础上。然而，关于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只给我们指明了几个路标，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奠定这些基础。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他的《旁注》，即所谓《哥达纲领批判》。这种不希望以更大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只给我们几个指针的愿望，然而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什么错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把这些问题展开来加以全面考察，几乎肯定是不成熟的。这样的开端几乎肯定会以乌托邦而告终，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本人才警告说不要这样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禁忌知识之树的果实，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尽管俄国革命已经证明，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1

除了确定新的生产制度的一般基础外，马克思还指出了在新社会中可以应用的社会调节和会计核算控制方法，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按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核算。建立共产主义一般基础的前提条件是，货币和市场必须完全消失，而马克思的门徒们，他们完只全关心共产主义生产的基础，却没有再进一步。在共产主义中，他们根本上只看到了我们在资本主义下所知道的经济资源集中的延续，这将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这种观点在希法亭的例子中体现的最清晰。他考察了资本完全集中在一个所有者手中的后果。他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巨型托拉斯的图景，并以下列文字描述：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将由一个主管机关自觉地进行调节，这个机关决定它的所有领域内的生产量。于是，价格决定成为纯粹名义上的，仅仅意味着总产品在卡特尔巨头为一方和大量的所有其它社会成员为另一方之间进行分配。那时，价格将不再是人们之间发生的物的关系的结果，而成为物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单纯的计算方式。于是，货币失去了作用，因为要完成的是实物的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分配，所以货币会完全消失。随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物的外观的消失，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消失，从而货币也消失。由卡特尔分配产品，物质生产要素被再生产出来并用于新的生产。在新产品中，一部分分配给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其它部分留归卡特尔随意使用。这是一个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但是，这种对抗是分配的对抗。分配本身被自觉地调节，从而使货币的必然性消失。这样，在它的完成的形式上，金融资本脱离开它赖以产生的土壤。货币流通变得不必要了，货币的不息流动达到了它的目的地，即被调节的社会。流通的永动机找到了它的最终归宿。”2

根据这一理论，向共产主义发展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这是一个自动的、无矛盾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就完成了这个过程。资本主义竞争导致资本的集中，通过这种方式，在产业中发展出大型的集团。这样的一个集合体——例如，一个把运输、采矿、轧钢厂等结合在一起的托拉斯——形成了一个没有货币的分配领域。上级管理部门只是决定把新的生产资料（扩大的再生产）送到哪个工厂，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等等。根据这种理论，共产主义生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无非是进一步实行这种集中，然后很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被取代，原因很简单，它成为工业企业进一步合并的障碍。消灭了私有制，集中的过程就能充分发展，然后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把整个经济生活结合成一个巨大的托拉斯，然后由上面管理。这样，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社会所设定的前提条件就得到了满足。市场将会消失，因为一个单一的企业不会向自己出售或购买。附在产品上的价格也随之消失，而上级行政部门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将产品从一个工业单位流向另一个工业单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有必要衡量每件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这显然是一个幼稚的错误。

因此，与共产主义经济有关的科学所采取的发展进程，并不是以一条直线的形式出现，而是在马克思之后，采取了一个不同的方向，直到1920年左右才回到它以前的经典位置。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意中帮助共产主义科学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向前迈出了慷慨的一步，这无疑是一个苦涩的讽刺。当资本主义的崩溃似乎在可预见的范围内，而共产主义即将席卷世界时，马克斯·韦伯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开始发展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当然，他们只能将这种批评与希法亭式“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还有本质上是一样的——俄式“共产主义”，而作为希法亭的忠实弟子，纽拉特却要被迫承受这种后果。他们的批评最后表明，一个没有任何调节手段或会计控制手段的经济，一个没有用来衡量产品价值一般标准的经济，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他们的抨击找到了正确的目标。结果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造成了相当大的沮丧和混乱。在经济科学领域，共产主义的不可能已经被证明了，其理由很简单：在这样一种经济中，每一种形式的计划生产都会停止。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基础试图证明自己存在权利的共产主义，表明自己甚至比资本主义更不适合于有计划的运作方式！布洛克接着又补充说，在没证明有什么控制手段来代替“市场机制”之前，他们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就连考茨基也失去了冷静，所以提出了一些最荒唐的建议，比如长期固定价格等等。不过，考茨基的这些疯狂转变有其积极之处，因为通过它们，人们认识到了建立社会调节和会计核算控制的制度之必要性，尽管考茨基当时实际设想的这种制度是在现今货币的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作为记账用的价值尺度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记录交换关系账目的方法”以及“一种流通手段”，货币将是不可或缺的。（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书目中文源未找到）

韦伯和米塞斯对共产主义的破坏性批评，在现实中起到了帮助共产主义经济研究的作用，克服了它的惯性，并将其置于真正的基础之上。正是他们唤醒了那些从那一刻起就不允许自己再休息的思想力量，因为正是从那一刻起，进一步深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概念之间的关系才成为可能。

作为国家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各种工联主义（syndicalist）思潮在1910年左右开始出现，它们试图通过“工团”（”sydicates”）、“产业工会”或“行会”来继续资本主义生产。这些组织会将其利润分配给工人，或者让利润积累到一个中央社会基金中。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从来没有经过任何理论上的阐述，除非我们可以把奥托·莱希特（Otto Leichter）1923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调控》（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n a Socialist Society）这样的著作考虑在内。这一研究总体上是以建立在劳动时间计算基础上的社会调节和会计控制方法为基础的，无疑这是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所得的最好的努力成果。在这，由生产者-消费者自己掌握的自主经济管理理论向前迈了一大步。书中相当诚实地提出了问题，尽管我们认为，莱希特没有对这些问题形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还称，在他之前，莫里斯·布尔甘（Maurice Bourguin）曾试图把共产主义经济建立在根据劳动时间消耗的会计控制的基础上。据莱希特称，后者的思想方法与他自己的几乎完全一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共产主义经济中的核算控制必须通过劳动时间来实现，尽管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在他们的核算方法中采用生产资料的范畴。例如，沃尔高（Varga，译者认为是Eugen Varga，生于奥匈帝国）在《共产主义》创刊第2年中第9-10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不用说，由于上文所述的错误，结果毫无价值。

然而，不仅在经济科学领域中对问题的定义上可以看到进步，而且在政治因素领域也能看到进步。经济专家只从生产和分配的角度考虑共产主义。然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现实中还有其他动机。国家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对它来说是相当的无关紧要。它同样拒绝接受它，由于这个原因，即实践已经证明，生产机器可以在被收归社会所有的同时，仍继续作为剥削机器发挥作用。例如，俄国革命确实从此政治角度揭示了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打听一下，现在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内部，有哪些关于新的共产主义经济的积极的思想和观念正在流传，我们就会发现，自主管理和运营的思想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还缺乏更详细的说明。尽管如此，现在每个人都认为，绝对有必要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明确性（clarity）。

2.自由共产主义

米勒-雷宁（Paul Arthur Müller-Lehning）在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册子中，表达了对明确性的强烈要求。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眼前的任务是造成普遍的破坏，而与此同时，探索如何重新组织社会的任务可以安全地留待无限的将来去处理（出处同上；第4页）。为了确定“在革命发生后如何实现无政府工团主义”（同上；第5页），必须要有一个方案。仅仅宣传经济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同上；第6页）。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把群众的自主性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但是问题是，群众的主动性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群众今天和明天究竟要做什么——所有这些都还是模糊的，只是稍有些积极的意义（同上；第7页）。“许多宣言出现了，但是对于日常实践的问题，只有极少数的宣言能够给出明确而简单的回答”（同上；第8页）。以下是引自米勒-雷宁的小册子：

“不得不说，俄国革命很彻底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没有工资制度的社会，其切实的和经济的基础是什么？革命后的日子该怎么办？无政府主义将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牢记过去几年的教训，如果完全失败的结论不至于是无可救药的破产。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解决办法，不管它们可能包含多少真理，不管它们可能被反复唱了多少遍，它们没有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特别是，它们没有解决社会革命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任何一个问题。”（米勒-雷宁，《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0页）

“没有这些实际现实，所有的宣传都是消极的，所有的理想全是乌托邦。是无政府主义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而且——这一点不能太经常地重复——已经通过俄国革命的痛苦经验不断得到了证明。”（11页）

“经济组织以剥夺资本和解除国家武装为目的。必须取代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关的正是工人的生产联合会，它必须作为撑起整个经济生活的支柱发挥作用。基础必须是工厂，工厂组织必须形成新的经济社会组织的胚胎细胞。”（18页）

“任何想看到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终结的人，必须用其他的现实和其他的经济组织来取代这些社会生活的现实。这只有生产者自己才能做到。他们只能集体地，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来做到这一点。在工厂里的集体，在工业中的集体，等等。他们必须组织起来，通过他们联邦式的工业组织来管理生产资料，从而在工业和联邦的基础上组织整个经济生活。”（19页）

1927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相比迄今为止其他试图澄清这个问题的所有小册子相比，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引人注目的繁多概念，而在于它确实试图吸收俄国革命的某些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未来阶级斗争的武器。对经济生活的联邦制设想源自俄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然而作者没完没了的证明，这实际上只是提出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没有一个人能提供解决方案。

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富尔（Sebastien Faure）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在1921年出版的《普遍幸福》（Universal Happiness）一书中，描绘了他对自由共产主义的构想。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无政府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并不一定排除对社会生产集中处理和控制的体制。因为仔细研究他的“自由共产主义”体制，就会发现它实际上不过是庸俗的国家共产主义。事实上，该书没有科学考察的性质，而更多的是以乌托邦小说的形式表现，“自由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纯粹的幻想中成长起来的。然而，与“人人平等”、“自由合意”和“反对国家及国家权力的崇高精神原则”这样的词句相反，书中描写了一种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对生产的控制权并不在生产者本身，这清楚地表明，至少在这个特定的阵营中，完全不用担心这个特定的作者会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他自己对适用于共产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有任何理解！

富尔反对作为“自在之物”的权力，为此，他谈到了成千上百的线索和纽带，这些线索和纽带违背人们的意志强行把所有在现代生产机器中合作的人捆绑在一起。他写道：“这整个组织（即他的体系——编者注）是建立在自由合作这一鼓舞人心的精神原则之上的”（第213页）。然而我们认为，这不能成为任何生产和再生产制度的基础。如果生产者希望使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无论是否有“鼓舞人心的精神原则”的帮助，整个组织就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生产者必须自己在工作场所决定生产者与社会产品的关系。他们必须计算每一种产品用掉了多少劳动时间，因为他们的劳动时间是他们在社会产品中的份额的尺度。只有这样，整个组织才能建立在经济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托某种飘浮在抽象原则之上的“精神”理想。